

德国智库动态

四川外国语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第 4 期 2015 年 4 月 30 日

本期主要内容

❖ 深度文章

- 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对各国经济与能源转型的影响
- 德以建交五十周年——机遇与挑战并存

深度文章

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对各国经济与能源转型的影响

自去年年中算起，国际原油价格一度下跌过半，半年时间跌幅之大可谓触目惊心。去年6月，油价还维持在每桶逾110美元的高位，而今年1月份已经跌到每桶45美元。此后，油价一直在每桶48美元至60美元的区间徘徊，且目前还看不到快速回升的趋势。石油作为国际主要通货之一，其价格变化会波及其他原料价格，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颇为深远。

国际能源市场从这个十年伊始就前所未有地缺乏安全感，市场参与者承压明显，而低油价只是在表面上缓和了局面，人们对未来油价的走势和原油需求的不确定性却在日益增加。低迷和起伏不定的油价导致新的石油勘探和采掘工程停滞不前，为将来的油价飙升和石油供给埋下了隐患。油价下跌还遮蔽了人们的双眼，令人忽略重要石油产区日益突出的地缘政治风险：拥有丰富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已经卷入中东地区的纷争，有些地区甚至面临战争风险；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危机还在持续发酵……而下跌的原油与天然气价格只会加剧这些危机。

在市场和价格的变化之中，欧洲更多时候只是一个“石油买家”。因为自身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匮乏，欧洲一直受制于油价的变化。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德国需要从自己的角度评估能源消费者到底能从低油价中获益多少。因为油价跌得越多，放弃使用化石能源和实施能源有效利用措施的机会成本就会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讲，低油价时代能持续多久事关重大。

油价下跌有利于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世界经济中，原油价格的重要性无可比拟。油价的暴跌给世界原油市场的贸易条件带来了剧烈变化。它导致了石油生产国和石油消费国之间、石油净进口国和石油净出口国之间的收入的重新分配。这种新格局对世界经济显然具有积极影响，因为石油进口国进口石油平均消耗的国民收入占比要高于石油出口国，且会迫使后者为弥补其收入损失而动用货币储备。

油价下跌对世界经济的积极作用还体现在当今油价主要由供给而非由需求决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若 2015 年和 2016 年的油价下跌 45%，每年可提高全球国民生产总值 0.3 至 0.8 个百分点。低油价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取决于一系列不同的因素，包括石油制品在国家价值创造中的相对比例、进出口额、经济状况，还包括市场参与者的态度与政治层面的反应。油价下跌带来的经济效应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大相径庭。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低油价时代持续时间越久，其在投资和消费决策方面的结构性影响就会越长远。

欧盟和德国无疑是油价下跌的受益者。据估计，欧盟成员国 2013 年进口石油的均价约为每桶 109 美元，原油总进口额约占欧盟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2.6%，预计 2015 年与 2016 年石油进口开支将大幅下降。油价下跌为欧洲和德国带来了三方面的益处：首先，低油价降低了暖气和交通支出，使民众有更多的钱进行消费；其次，企业的采购和生产费用得以降低，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提高产量、增加盈利或者扩大投资；另外，油价下降还有间接的好处：一方面，能源价格的下降带来的物价下降可以提高货币购买力、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增加员工工资且暂无通货膨胀之忧；另一方面，盈利环境的改善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在股市的估值，而且可以增加国家税收，还可减轻欧元区外围国家偿还债务的压力。总而言之，原油价格下降使欧洲经济受益匪浅。它既刺激了消费和投资，又拉动了生产、经济增长和就业。但是，相较于对石油依赖程度更大的其他经济体（如新兴工业国家），欧洲并非是油价下跌的最大受益者。而且自 2014 年 6 月以来，欧元随着油价下跌而同步下跌，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明显贬值。因此，与诸如美国之类的国家相比，欧元区国家的贸易条件只改善了一半左右。此外，国际原油市场的价格下跌还进一步压缩了欧洲的货币政策空间，因为欧洲央行现行的指导利率已经在零利率附近浮动，几无继续降息的空间。如果欧元区的经济持续低迷，那么其面临通缩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日本的境遇在很多方面都与欧洲类似。日本 2013 年的石油进口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3.0%，其对石油的依赖性甚至高于欧洲。在福岛核泄露事件之后，日本被迫转向化石燃料发电。即便电力公司因油价下跌而省下的成本传导至用户的速度有所延迟，日本也能在生产成本和购买石油方面获益。但是同欧洲类似，这些正面影响受到了削弱，日元自 2014 年 6 月以来的走势同样疲软，日元兑美

元的汇率亦随着油价的下跌而同步下跌。而且日本不景气的经济也面临着通缩的风险，油价下跌对物价的抑制作用也使货币政策进退维谷。

油价下跌在美元坚挺的走势下对**美国**经济的益处显而易见，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和中产阶级受益于货币购买力的上升，其 2015 年的消费支出或将大幅增长。而且美国经济不存在通缩风险，油价下跌对物价的抑制作用或可推迟美国央行今年年中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的计划。但美国自身也是重要的产油国，油价大跌对去年年中还在大幅扩张的油企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石油领域的投资面临崩溃，并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为油价的不确定性而无法恢复元气。

赢家

诸多理由表明，大量进口石油的新兴工业国家或是油价下跌的最大受益者。首先，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对能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其次，能源与肥料价格下跌造成食品价格下降，从而使广大民众的货币购买力上升。第三，新兴工业国家的货币政策有足够的回旋空间。第四，进口石油费用的降低对这些国家平衡国际收支有积极影响。一般来讲，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所占 GDP 的比例越高，油价下跌的正面影响就越大。目前来看，该比例至少占到 4% 的智利、巴基斯坦、南非、韩国、台湾和土耳其成为了大赢家。从区域看，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度）以及东南亚地区（文莱和马来西亚除外）也获益颇丰。

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无疑是此次油价暴跌的最大受益者，且国家层面和经济层面的获益要大于与石油相关的财政部门和企业。石油在中国所有能源中的占比只有 18%，而燃油税已经提高了三次。中国正在积极增加其战略石油储备，能源领域的国有企业则利用油价下跌带来的意外之财消化其过剩的生产力并偿还债务。此外，油价下跌对物价水平的抑制作用使得货币政策有了更加宽松的空间。油价下跌的负面影响主要在于抑制了中国改进能源体系的积极性。

输家——石油出口国

油价下跌的最大输家是依赖石油经济的传统产油国。在页岩气革命（**de Fracking-Revolution**）之前，俄罗斯一直被看作超级能源大国，克里姆林宫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也都是基于此定位而制定的。然而，俄罗斯的国内经济一直受到原材

料生产对其他经济活动的掣肘（即所谓的“荷兰病”¹）以及普遍缺乏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俄罗斯目前疲软的经济状况正遭受着三重打击，分别是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下跌、卢布贬值以及因为乌克兰事件而受到的经济制裁。由于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都是建立在卢布成本结构的基础之上运作的，而俄罗斯政府通过部分减免生产税的政策来抵抗油价下跌，因此对国内已开工项目的投资会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在高位运行。但西方的制裁已经威胁到了俄罗斯境内的投资活动。俄政府必须立即开发新项目以维持现有的投资水平。但是，由西方企业参与的北极地区项目与非传统投资已然停滞不前。除了俄罗斯自身，西方的合作企业也受到殃及。仍在继续推进的只有在国企联盟框架内同中国企业的合作项目，但这对俄罗斯劳动力市场以及配件工业的益处不大。

石油供应安全与能源转型

油价下跌对石油的供应安全具有反作用。北海地区的石油输送已经面临压力，挪威（北极地区）输油管道的扩建也首次被叫停。尤其是由西方跨国公司推动的项目更是由于油价下跌而面临困境，包括销售和盈利缩水、市场资本总额下降、投资项目成本增加等。

即便下跌的油价看似阻碍了传统化石能源使用成本的日益升高，对现有能源体系进行改造仍旧十分必要。如果说我们目前的能源转型措施仍主要局限在发电领域，那么接下来就要转向供暖和交通领域。油价下跌对这些领域的影响较大，因为大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建筑物和汽车能源消耗的动力会随着油价的下跌而减弱，而这将导致为期多年的锁定效应，使节能减排更加困难。因此，我们要利用现在的低油价时期推行新的刺激政策，例如调节与提高燃油使用税。鉴于未来可能的油价波动和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风险，能源转型将是德国能源供应安全最为重要也最为可靠的政策支柱。

（本文为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时事(Aktuell)》杂志 2015 年 4 月刊文章，作者汉斯·君特·希尔伯特、克斯滕·韦斯特法尔。）

¹ 荷兰病：指一国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

德以建交五十周年——机遇与挑战并存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以色列将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迎来建交五十周年。虽然在犹太人大屠杀这一背景下，两国之间从来谈不上存在正常关系，但德国和以色列的高级代表在这一纪念年还是近乎奇迹般地明确表示要达成信任关系，并在两国间建立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是德国与近东及中东的任何其他国家所不曾有的。然而，这种亲近本质上还是上层规划。在社会层面，两国的关系正渐行渐远而不是越走越近。尤其是两国对如何解决巴以冲突问题存在意见分歧，这使得两国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因此，纪念年对德国政界和社会来说可能是一次机会，让人们可以思考什么是历史责任以及这种责任对德国的对以政策具有何种意义。

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与双方社会间存在的矛盾

虽然德以双方的双边合作关系多种多样，但它们始终停留在精英阶层。除了合作的直接参与方之外，这些项目几乎没有对两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它们为两国的相互理解或观点的接近所做的贡献微不足道。

德国和以色列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完全不同。说得不客气一点，战后在战争挑起国中按照“不再发动战争”的主导思想形成了军事克制、放弃主权和多边贸易的政治文化。而在受害国中，在“不再重现奥斯维辛悲剧”的警示下，人们首要的愿望是国家独立、军事强大和建立核威慑能力。这些意识由于各自的地缘政治环境而变得更加牢固。这样看来，两国人民互不理解、形同陌路也就不足为怪了。

与此同时，在过去几十年间，两国人民对对方的认知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体来说，以色列人对德国的看法日趋正面，而德国人对以色列的看法却正好相反，这点从 2014 年巴以在加沙地区爆发冲突时德国几大城市爆发的反犹事件以及针对特定话题的问卷调查中可见一斑。

一方面，德国人对以色列的认知受到历史罪恶感和中东冲突的影响。与政治精英不同，越来越多的德国民众拒绝出于历史责任而为以色列的安全负责，但他们仍然认为应该鉴于本国的历史在保护人权和防止战争爆发方面承担特殊责任。贝塔斯曼基金会 2015 年春季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只有 40% 的受访者认为

德国对犹太民族负有特殊责任；约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始终要为迫害犹太人的罪行承担责任感到气愤，在 18 至 29 岁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甚至接近 80%；55% 的人想要将过去的历史一笔勾销。相反，在以色列，77% 的受访者拒绝对过去的历史做一个了结。此外，有近四分之三的以色列人认为德国对犹太民族始终负有特殊责任。

德国人早已不再将以色列视为那个在 1967 年中东战争中受到强大阿拉伯世界威胁的弱小国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尤其为德国人所诟病。在他们看来，以色列人至少应为巴以和平进程的停滞不前和暴力重现与巴勒斯坦人承担同等责任。以色列常被认为过度使用暴力。在这一评价中，以色列受到的周边环境对其安全的威胁却几乎没有被纳入考虑范围。

在这一背景下，德国政府的对以政策也遭到了德国民众的批评。例如 2014 年 7 月和 8 月巴以冲突爆发时，德国各个政党的议员都近乎本能地站在以色列一边，强调其拥有自卫的权利，而当年 8 月德国电视一台发起的一项民调却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和 Hamas 对战争的升级负有同等责任。此外，大多数受访者还认为德国不应该选边站而应保持中立。根据前面提到的贝塔斯曼基金会的调查报告，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拒绝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另一方面，超过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却对德国拥有正面印象。这一数据来自阿登纳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其依据是针对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问卷调查。由于德国在以色列的课本中几乎是大屠杀的代名词，因此以色列的年轻人对德国的印象要坏于平均值，但矛盾的是，这些年轻人心中存在着柏林热。并且，虽然大多数以色列人一如既往地将德国人与大屠杀联系在一起，但同时他们也将德国视为一个稳定的西方民主国家，一个拥有创新能力、一流产品和高品质生活的国家。八成的以色列受访者将德国视为重要合作伙伴，将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可以完全信赖德国。基于这个原因，以色列人也希望德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他们与德国人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一个更加积极的德国应该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以及伊朗人的冲突中支持以色列，应该在欧盟和国际组织中为以色列的利益说话，还应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支持。

紧张的政治关系

尽管双方有着紧密的双边合作关系，但默克尔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之间仍然不时表现出紧张的政治关系。两位政府首脑及其顾问曾进行过多次激烈的通话；联邦总理默克尔数次公开批评以色列的移民政策——当然这种批评总是发生在美国总统表明了相同的态度之后。

在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签订《奥斯陆协议（1993-1995）》后的 20 年里，德国的政治精英阶层难掩对巴以和平进程停滞不前的失望。他们认为以色列总理至少应对此负有同等责任。以总理在 2009 年首次声明支持两国的和解方案，而之后在占领区内不断发生的移民行动使他失去了信誉——何况他在 2014 年还曾表态不会允许巴勒斯坦建立主权国家；在 2015 年 3 月的大选期间，他再次明确了自己的态度。

有鉴于此，柏林愈加认为以色列的政策与自己的判断相违背。柏林认为，只有通过巴勒斯坦人签订两国协议、与其它阿拉伯近邻达成和平方案并进行区域合作，以色列的安全才能得到最佳保障。从 20 世纪九十年代起，德国就开始积极推动巴以和平进程、中东多边谈判以及由欧洲发起、旨在将以色列纳入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网的动议。1994 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伊始，德国就是巴勒斯坦人最大的双边捐助者之一。巴勒斯坦从德国对外援助及发展资金中获得了最高的人均援助额。除了对和平进程的支持，德国还特别重视巴勒斯坦的国家机构建设。

不容忽视的是，德国对和平进程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支持并没有缓解冲突，反而使目前的冲突变得棘手。事实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根本没有达成两国和解方案的意愿。更确切地说，单一国家的现实得到了加强，以色列几乎完全控制了地中海与约旦河之间的地区。而根据国籍、居住地和民族-宗教属性的不同，这里的居民享有的权利也存在差别。由于移民区的开发、约旦河西岸的屏障、对东耶路撒冷的分割以及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巴勒斯坦地区已经支离破碎。此外，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政治反目也埋葬了巴统一的可能性。尽管在过去二十年间，巴勒斯坦得到了大量捐助资金的支持，但由于遭到持续的占领，这里的经济根本无法得到可持续发展。

柏林政府对以政策的一贯态度与变化

联邦政府至今仍然遵行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大部分德国中东政策。他们尤其坚信，只有通过直接的双边谈判才能解决冲突，而且他们一直将美国视为这类谈判的关键角色和斡旋方。联邦政府认为，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会适得其反，他们更看重积极的促进方式。柏林不赞成单边行动（诸如以色列的移民政策与巴勒斯坦人的国际化努力），认为这会危害和平进程。此外，联邦总理默克尔觉得自己有个人义务为以色列的国家福祉负责，并将其安全视为德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她满足了内塔尼亚胡的要求，明确承认以色列为犹太民族国家。这样一来，带有民族-宗教性质的以色列国家身份就将本国中的非犹太公民（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 20%）排除在外了。

停滞不前的巴以和平进程也导致了柏林政府近几年的政策转变。例如，德国现在已不再积极充当“以色列在欧洲的友好大使”的角色。虽然在欧盟对以色列的态度日益趋于批判时，联邦政府不会暗中煽风点火，但其现行的对以政策更接近欧洲各方立场的中间态度。柏林一方面致力于协调欧洲采取共同立场，另一方面，其在过去几年也不再试图阻止欧洲采取惩罚以色列的措施，甚至还参与了这一过程。例如，由于 2008 至 2009 年的加沙战争，德国终止了一项由其推动并于 2008 年获得原则通过的欧以关系升级计划；接受了一些欧洲行动纲领，纲领要求从 2014 年起禁止在 1967 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对以机构和活动进行资助；委托欧盟委员会扩大移民区产品标记的准则等。

在这个过程中，柏林最终开始相信国际社会为解决冲突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有利于巴以和谈更具建设性和目的性。因此，德国在 2011 年 2 月与英法两国一起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巴以和平方针，但由于美国的否定最终没能实施。2014 年 12 月，约旦向安理会提出了以军于 2017 年底前结束占领的解决方案，又反过来遭到柏林的拒绝，因为德国联邦政府始终不赞成规定具有约束性的时间表或实施强制措施，更何况是国际性的强制规定。

2012 年 11 月，德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就巴勒斯坦能否以“非成员观察国”身份加入联合国的投票中弃权，这是迄今为止德国政府对以色列所采取的政策的最为强烈的一次情绪表示。这次弃权标志着其在承认巴勒斯坦作为主权国家问题立场上有所软化。同时，德国始终坚持巴勒斯坦的建国必须通过谈判完成，只有这

样它才会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主权国家。

(本文摘译自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时事(Aktuell)》杂志 2015 年 4 月刊文章,
作者穆里尔·阿瑟堡(Muriel Asseburg))

《德国智库动态》由四川外国语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根据德国各大权威智库的公开信息编
译, 每月 30 日出版。

通信地址: 四川外国语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 邮编 400031

电话/传真: +86 23 6538 5696

电子邮件: dgyjzx@sisu.edu.cn

网址: dgyj.sisu.edu.cn